



学界巨擘 名师风范

——纪念钱伯海先生诞辰 85 周年

文 / 洪永森 杨 灿

钱伯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今年是钱伯海先生诞辰 85 周年，也是他不幸离开我们的第十个年头。借此缅怀先贤和恩师，我们对先生的毕生伟业、学术贡献和名师风范更感到由衷的钦慕和景仰。

一、生平伟业

钱伯海先生 1928 年出生于江苏泰兴。新中国建立初期（1951 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即由我国经济学泰斗、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教授亲自选聘到厦门大学任教，并在厦大数十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王亚南校长强调从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经济问题，非常注重统计调查研究。厦大经济统计学科就是在王校长这种办学理念指导下，由以钱伯海先生和黄良文先生等为代表的一辈经济学家创立和发展起来的。

在厦大，钱伯海先生曾先后担任厦门大学经济系副主任、计划统计系主任和经济学院院长等行政职务长达 32 年之久。在校外，他还曾担任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第 1 - 3 届）、专家咨询组组长和顾问（第 4 - 6 届）、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国民经济统一核算标准领导小组总体规划组组长，以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第 2 - 3 届）等诸多社会学术兼职，并受聘担任近 20 所高等院校的兼职、客座或特聘教授。

在担任繁重的院系行政工作和各种社会学术兼职的同时，钱伯海教授将主要精力用于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以执着的科学精神和超人的毅力长期勤奋工作，可谓“著作等身”、“桃李芬芳”。他先后撰写或主编 30 余种研究专著和全国统编（或规划）教材，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累计著述总量达 1200 万字以上，其中若干主要成果汇集在煌煌五卷《钱伯海文集》中（由中国经济出版社于 2001、2002 年出版）。他的科研成果有多项获得国家级奖励以及更多的省部级奖励，他本人多次被评为福建省劳动模范、文教战线先进工作者、优秀专家和突出贡献专家，以及国家部委系统的优秀教师，受到福建省委、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有关部委的奖励与表彰。他长期坚持一线教学工作，并从 1980 年起招收研究生，是国内最早招收统计专业研究生的导师之一；截至 2004 年为止，他累计招收和培养了 40 余名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在当时是招生人数最多的本学科博士生导师之一），以及 20 余名硕士研究生。他培养或指导过的众多弟子如今在国内、国外各行各业努力工作，不少已经成为业界精英、政界翘楚或学界栋梁。

在国内高校中素以人文社会科学等理论研究见长的厦门大学，钱伯海先生是迄今为止全校仅有的六位文科资深教授之一，也是厦门大学统计学国家级重点学科的主要创立者和老一

辈学术带头人。钱先生毕生坚持真理，勇于探索，开拓创新，成就斐然。他是“国民经济学”和“国民经济统计学”等多门经济与统计新学科的奠基人，他提出的“国民经济核算平衡原则”被称为“钱氏定理”，他对中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建设和发展贡献卓著，不仅在我国统计学界、而且在经济学界都享有重要的影响和崇高的威望。

二、学术钜献

钱伯海先生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理统计专业，在厦门大学任教后，凭借其精深的科学素养和独具的研究功力，根据理论和实践的需要转向经济统计学的教学和研究，进而又逐步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经济探索和创新。他的研究领域既宽广、又深厚，其理论建树硕果累累。在他的诸多学术贡献和理论遗产中，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弥足珍贵，值得我们努力探究、发掘、继承和发展。

（一）创建“国民经济统计学”新学科

在 1980 年以前，我国高校的经济统计学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只有部门统计，没有综合统计；或者即便有，后者也只是各部门或各专业统计的简单拼凑，既重复累赘，又缺乏系统的理论梳理和归纳整合。钱伯海先生从 1972 年起接受原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委托，带领团队专门研究美国的国民



生产总值核算方法和国民收入统计体系,取得重要成果。以此为契机,理论联系实际,经过深入调研、反复探索和提炼归纳,形成了专著《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学》,并用于厦门大学的经济统计专业教学。1978年,钱先生应国家统计局领导的要求将该书作为新学科教材带到全国统计科研教学会议上交流,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好评,并迅速以油印本形式流传到国内许多高校;钱先生在厦门大学开设的相应课程也吸引了国内众多高校的教师访学进修,一时蔚然成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正式出版了该著作,《世界新学科总览》等辞书将其作为新学科的代表作给予专门推介,该书在1987年国家教委组织的全国高校优秀教材评选中荣获国家级奖励。

鉴于“综合平衡”本来就是“国民经济统计”的题中应有之义,此后,通过经济统计界同行的共同探讨,并充分吸收国际上先进的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和经验,该学科及其教材逐步演进为现今的“国民经济统计学”或“国民经济核算原理”。钱伯海教授主持并邀请国内各高校知名专家共同编写了该学科的多种全国统编教材和国家级规划教材,这些教材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统计教材奖、全国统计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多种奖励。现在,“国民经济统计学”已经成为国内各高校经济统计的主干课程,也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基础。

(二)提出“国民经济核算平衡原则”

在创建“国民经济统计学”的过程中,钱先生理论联系实际,针对当时世界上长期并存的两大国民经济核算模式——即东方国家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和西方国家的国民账户体系(SNA)——进行潜心钻研,以其敏锐的理论洞察力,见常人之所未见,发现两大核算模式既有显著差别、又有基本共性,从而创造性地归纳、提炼出了著名的“国民经济核算平衡原则”。这一原则的经典表述是:“生产范围划在哪里,产值指标就算到哪

里,中间消耗和最终使用也算到哪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原始收入与派生收入就在哪里分界。”该原则以十分晓畅而又异常精练的语言,准确地揭示了国民经济核算中各种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的基本原理,从方法论的角度高度概括地总结了纷繁复杂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各种操作规范和细节规定的理论依据,对于正确把握和运用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和方法能够起到提纲挈领、以简驭繁的重要指导性作用。该原则的首次完整表述出现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学》一书中,此后又被进一步提炼、阐发以专题论文《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发表于国内顶尖人文社科期刊《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此后还被译为英文发表于《Social Sciences in China》,影响广泛及海外。以上论文获得国家教委颁发的首届全国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内人文社科成果的最高奖励);在国家统计局1992年颁布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中,该“平衡原则(整体原则)”的基本内容被载入第一章;该原则还被人们称为国民经济核算或国民经济统计中的“钱氏定理”。其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国民经济核算平衡原则不仅对于理解和把握MPS和SNA两大核算模式具有显著理论价值,而且对于同一种核算模式下正确地进行经济统计和经济分析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鉴于此,钱先生针对经济理论和实践中违反平衡原则的种种典型事例和严重谬误撰写了专题论文《正确认识社会产品、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予以澄清(刊载于《经济研究》1983年第5期),并对平衡原则的理论意义不断进行提炼、开掘和提升,使其更好地发挥理论基础作用。

(三)充当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的理论先驱和斗士

钱先生不仅亲历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和发展的主要过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发挥了重要作用。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率先研究国际上先进的国民经济核算成果和经

验,到此后创立中国的“国民经济统计”学科,提出“国民经济核算平衡原则”,这些都为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作好了必要的理论铺垫。钱伯海先生还组织厦门大学的研究团队和全国高校的经济统计同行协同攻关,先后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六五”和“七五”时期的两个重点项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通过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编制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获得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同时,自1984年起,他担任国务院国民经济统一核算标准领导小组的总体规划组组长多年,直接参与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设计等工作。鉴于在中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过程中,面临许多重要理论难题,尤其对于第三产业是否应该纳入国民经济生产范围,经济理论界存在很大争议。钱伯海教授意识到,其“核心在于劳动价值论,在于生产劳动范围,这是长期存在的争论,而且常常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争论”。出于理论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他毅然以大量精力投入到相应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之中,充当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卫士”和“斗士”,先后出版了《社会劳动价值论》和《经济学新论》等著作,并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学家》和《理论前沿》等多种报刊上发表大量论文,论证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必要性、必然性和科学性,为我国国民核算体系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获得了包括国家统计局主要领导在内的理论和实务界同行的高度赞扬和肯定。

(四)改造经济统计学的课程体系

如前所述,我国高校的经济统计课程和教材曾经长期受苏联影响,按工业、农业、商业、基本建设等部门和劳动工资等专门领域分别开设,种类繁多,内容琐碎,而且相互重复,大多流于政府统计实务的指标解释,缺乏理论和方法的技术含量。有的著名学者专家质疑其科学性,广大教师和学生也反映强烈,要求改革。对此,钱伯海教授通过对原有经济统计课程

体系的深入剖析,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巨大的共性:一是活动条件,二是要素投入,三是成果产出,四是投入产出对比的经济效益。基于这些共性,他提出了整合各部门经济统计学(包括第三产业),建立“企业经济统计学”的构想。并身体力行,亲自主持形成教材提纲,组织兄弟院校的专家编写出版了《企业经济统计学》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该教材既提高了经济统计的理论水平,又兼顾了各部门统计的共性和特点,在教学实践中收到良好效果,于1997年获得首届全国统计优秀图书奖。鉴于微观层面的“企业经济统计学”与宏观层面的“国民经济统计学”相互对应,构成完整的经济统计学课程体系,后经全国统计教材编审委员会审定,确定将这两门课程均列为我国高校的统计专业主干课。此举顺应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高校经济统计学专业教学的基本格局。

(五) 构建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新学科体系

长期以来,经济学和统计学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学科分支和分类体系。钱伯海教授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认为整个经济活动存在两个层次的运动,即国民经济运动和企业经济运动。为此,需要建立四门密切相关的经济、统计新学科,即“国民经济学”和“国民经济统计学”、“企业经济学”和“企业经济统计学”,从而形成相对完整的经济与统计学科体系。经过多年努力,他主持撰写的各门新学科著作已陆续出版问世。

除了已如上述的两门统计学著作外,他主编的新学科专著《国民经济学》出版于1986-1987年(上、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1992年主编出版《国民经济学》教材(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出版个人专著《国民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该系列的新学科著作以国民经济整体为研究对象,将政治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熔为一炉,出版之后受到经济理论界的重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

宋涛、谷书堂、李成瑞等先后在《人民日报》、《经济研究》、《经济学家》上发表书评,给予高度评价;《世界新学科总览》等新学科辞书也把该书作为新学科的代表作专门介绍。该书获得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教育部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20世纪90年代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修订研究生专业目录,钱伯海教授作为经济学科评议组的成员,根据我国的经济体制变化和学科建设需要,建议整合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和投资经济等学科设立国民经济学,得到采纳,国民经济学遂成为经济学中独立的二级学科。目前,我国部分高等院校设立了国民经济学的博士点和硕士点,专门培养该专业的高级人才。至于“企业经济学”,虽然没有单独的专著或教材问世,但在钱伯海先生已出版的《经济学新论》(全文本和简要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2002年)中有专门篇章(第三篇各章)论及,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钱伯海教授通过这些著述在经济学领域中不懈探索,取得长足进展,提出不少独到见解和创新观点,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以上所述仅涉及钱伯海先生在相关领域的若干重要贡献,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尚待各位学者专家共同发掘和探讨。

三、名师风范

钱伯海先生长期担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院系行政领导,在学科发展和建设上兼具超常的战略眼光和务实精神。在他主持工作期间,厦门大学计划统计系创办了经济信息管理专业和国民经济与核算研究所,先后获得统计学、数量经济学等硕士学位授予权,以及统计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并在首次重点学科评估中获得全国第一个统计学国家级重点学科。从行政岗位卸任之后,他仍然心系学科建设,充分尊重和大力支持继任院系领导的工作。

无论作为一位普通学者或是名家大师,钱伯海先生总是兢兢业业、勤

奋工作,惜时如金、淡泊名利,团结同事、大公无私。他胸怀宽广,民主待人,注重培养新生力量;海纳百川,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理论联系实际,提倡在科学问题上独立思考、人人平等,常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教导弟子不要“人云亦云”,还常用“牛耕田会老,闲着也会老”这句朴实的农家谚语自勉并勉励弟子。正是这些优良的学术品格和独具的人格魅力,造就了他毕生的非凡业绩。他在学术上不懈追求,生活上简朴自然,用辉煌的一生实践了厦门大学“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是我们学习和仿效的楷模。

钱伯海先生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但他的风范和伟业长存,他留下的道德文章、学术思想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我们努力传承并发扬光大。尤其当前处于统计学科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怎样在一级统计学科的大背景下,推进我国经济统计学学科的健康发展,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与逐步完善,以及中国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经济统计学也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并与数理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相关学科交叉融合,以求更好地指导中国经济实践。作为一位具有数理统计学背景的著名经济统计学家,钱伯海先生求真务实的治学理念和不断探索的科学精神,仍将继续发挥重要的典范和指导作用,我们从先生留下的精神遗产中仍将获得许多重要的启迪。

谨以此文作为对钱伯海先生诞辰85周年的纪念。☞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厦门大学国民经济
与核算研究所